

很多時候很多事情就像是老天早已安排好一樣。第一次與計冠光先生(大家叫他 KK)認識是在電話里,我加州的朋友給我郵箱傳了:匹茲堡要舉辦首屆《中華文化節》時間定于 2015 年 9 月 19 日,地點是匹茲堡最著名的人氣最旺的匹茲堡大學主樓側廣場。首次中國節是由匹茲堡華計冠光先生與一批熱愛中華文化的華人一起組織策劃的。

匹茲堡也是本報堅持送報 10 多年的瀋陽一個城市,匹茲堡華人對伊利華報有着特殊的感情,雖然匹茲堡廣告很少,但有熱心支持本報在匹茲堡發行的華人,使得本報至今從不間斷送匹茲堡地區,給匹茲堡華人送精神食糧。我總是有一個期盼,伊利華報會在匹茲堡有它生根開花的一天。雖然這一天還沒有來臨,但匹茲堡有許多華人精英在美國有一定的影響。只要有一天有一個華人想在匹茲堡創辦一份屬於當地華人的報紙,想這一天不會太遠。

計冠光先生是我剛認識不久的一位匹茲堡的華人。三年前自己創辦了具有特色的中文學校“匹茲堡中華文化語言學院”,他有自己獨特的一套教學方案,以小型班為主。他表示在美國教中文,一周只幾個小時,首先要從興趣來吸引學生學習中文,

他表示好的教學方法比教材更重要。三年創辦中文班有了很大起色,讓他有更多的時間去想為匹茲堡華人做一點事情。他滿懷熱情在他的創意下,他和一群和他一樣愛中華文化的人,啓動了匹茲堡首屆《中華文化節》。這就是我二月的一天去了他創辦的中文學習班與他見面聊的內容,這也是我第一次與他見面。

今年 72 歲的計先生,他有一份夢想,帶着一份責任,去迎接挑戰他的人生,他的那一份激情感染了我,3 月 27 日,他與伊利華報報社鄰居,每逢周五,匹茲堡東方舞蹈學校創始人吳燕來專程來到這里教舞蹈,計先生便一起搭車從匹茲堡來報社與我見面。他早期自己曾經做過生意,開過建築公司。他到美國已經有 28 年,在匹茲堡有一定的人脈基礎,自 2014 年 5 月,他在紐約總領事訪問匹茲堡與匹茲堡各華人團體領袖會面時,提出匹茲堡華人團體聯合舉辦《中華文化節》的想法,得到了所有華人團體的響應和總領事的鼓勵,使他更有信心。

第三次我們在報社見面,我們整整聊了 5 個小時,72 歲的計先生有着一顆年輕的心,他告訴我這個月他為了奔波《中華文化節》的籌備工作,目前已經基本有了眉目,當他得知五月俄州將在哥倫布與克利夫蘭都有亞洲節活動,他興奮地說一定要來取經學習。

正逢同一年(1947 年),國內戰爭全面爆發,但那時還能在杭州舉行解放前的全國運動會,我父親是運動會主要職員,他率領全華北地區運動員,在青島搭船前往上海,再轉道杭州,趁此機會,父親帶了我和弟弟同船到上海,要把我和弟弟交給大伯父的孤兒院。當時的情況,計先生還歷歷在目。回憶起當時他與弟弟跟着運動員,坐在一個像電影《甲午海戰》中那樣輪船的大統艙里,還記得運動員們圍起來跳舞的場景。誰知這船行到一半,停住了,並開始往下沉,記憶里他知道人們慌亂起來……好像過了很久,前方有一艘美國兵艦來到我們船旁,很高很大。我看見兵艦上放下來的繩梯,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相貌不同身材魁梧的洋人,我十分害怕,一個水兵來抱我,我哭了,水兵只好幫我父親拿行李,由我父親親自抱我攀爬繩梯,我們安全到了上海?????

到上海後,我和弟弟就被送到我大伯父創辦的“中國佈道會上海江灣兒童樂園”里。這是一所孤兒院,收養了幾十名 15 歲以下的男女孤兒。當時我大伯父並沒有把我們當養子對待,只是把我們當孤兒一樣收養。從這進去兒童樂園“到解放,我們在園中只見過大伯父一次,而且還是在一次‘感恩節’的基督教儀式上,儀式完了,大伯父也沒有單獨與我們交談,他也沒問一問我們是誰?不

計先生 1943 年出生在中國青島,他上有三個姐姐一個哥哥,下有四個弟弟一個妹妹。父親也是一個優秀生,大學畢業被點名去了青島當了電報局長,日本侵華,父親不願意為日本人做事,就離開了青島電報局,流亡內地,家里貧困,母親吃苦耐勞,賢惠樸實,雖然窮,但父母對孩子們說學習與教育很重要,記憶中的父親對我們兄弟姐妹未來選擇前途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選擇政治,也許是我父親對政治特別敏感,他和我們全家人都為政治吃了許多苦。90 年代,我的九個兄弟姐妹基本時間都與父母在美國,唯獨我到處奔波,在某種意義上我也許是一個不孝的兒子。

在我五歲的那年(1947 年),家中已經有九個兄弟姐妹。我有一位大伯父計志文,他是中國基督教歷史是一個重要人物。他去青島傳道,見我家子女多,而他自己沒有子女,希望我父母獻出一個子女給他,按基督教的說法,就是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神,一生宣揚神的真理。我父母商量後就決定把我和我 4 歲的弟弟“奉獻”給神。那個時候我大伯父在中國人中,爲了擺脫西方人,他是完全由中國人自己創辦基督教會的第一人。他一生創辦了許多的孤兒院,他也被稱爲“孤兒之父”。大伯父繼續傳道希望我的父親將我和弟弟送到他的上海孤兒院。



過我和弟弟在這孤兒院里的地位還是與衆不同,有些工友在背地里都叫我小院長或小主人。也許那個時候兵荒馬亂,後來聽說:解放前夕,我的大伯父計志文他創辦的“基督教中國佈道會”在中國的所有事務、產業、學校、孤兒院,全都交給基督教圈內的能人,但這些人,出于對共產黨的恐懼,也一個個辦事人員一個個離開大陸,令中國佈道會的事務群龍無首,屬於佈道會的學校、孤兒院的開支,已無從着落,大伯父只好請不願離開中國的父親代管。我父親當時還是一個無神論者,根本不是基督徒,出于對當年事業的幫助,也就毅然從青島南下上海,成了計志文牧師的代理人。解放後,我父親又把在青島的家,全部搬到了上海,就把家安置在上海郊區的“飛虎灣”。而我的全家人在解放後,包括文革期間的坎坷遭遇,與我父親不願意接近政治和跟基督教中國佈道會有直接的關係。

不知不覺計先生在報社講他的故事已經過了晚餐時間,我邀請他離辦公室不遠的華都海鮮自助餐廳享受晚餐,我們邊吃,我又讓計先生繼續講他的故事。

1949 年上海解放了,我父親被邀請爲上海市政協委員,邀請信由當時擔任上海市長陳毅親筆書寫。我父親他對國民黨政府早已失去信心,對共產黨也無惡感,但卻無意涉及政治,因此決定不接受這個邀請。那年我 7 歲,雖小,但已懂得父親爲此事惶惶終日。陳毅的信,撕也不是,藏也不是,弄得他束手無策……但我父親終究沒有去出席政協會議。由此運就開始臨到了我的頭上。我父親從“不跟共產黨合作陞級到對抗共產黨領導。”他的罪名越來越大,政治高帽一個



這些天俗務纏身,一無詩意,  
見衆詩友佳作連連,不勝感嘆!  
雖春姍姍來遲,然終春意怡然,  
前用《鳳凰台上鳳凰憶吹簫》寫  
過一“秋吟”,每句都嵌“秋”字,  
共用 26“秋”字。今忽想何不再  
寫一“春嘆”,亦每句嵌“春”字,  
竟成,恰亦 26“春”字也。詞雖不  
甚工整,然昏庸老朽,才力所限,  
諸君見笑亦無妨。

當春時節  
春在何處  
苦坐春山臨望  
姍姍春來  
絲絲春雨  
卻涌春水滿江  
記得那年春好  
風暖氣和滿城春

春日偏能惹恨長  
忽驚春去速  
自知白髮非春事  
春深處  
做一場春夢  
春去惆悵  
調寄《鳳凰台上憶吹簫》  
KK 于乙未年清明



2015 首届“匹茲堡中华文化节”是由匹茲堡众多华人团体筹办的一个大型联合活动。活动将于 2015 年 9 月 19 日,在匹茲堡 Oakland 地区匹大地标 Cathedral of Learning 附近街道举办 (approval pending)。这将是匹茲堡华人届第一次联手向主流社会大规模展示中华文化的风采。

这次活动将以展会形式进行,暂定的展出项目包括:文化、教育、文艺、饮食、科技、生活,传统工艺,美术,书法,杂技等各方面…

这是一个展示产品,技巧及创新的最佳平台,欢迎社会各界华人携自己的拿手绝活倾情加入,鼎力支持!

有意者请按下列方式联络:  
邮箱: pccf2015@gmail.com



接一個。更嚴重的事發生在 1951 年,中國佈道會的事務被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分會”接收後,在我父親的頭上多了一個黨的領導人,他只想做一個自由人,辭去了救濟總會的工作,那個年代哪有自由人? 從此他的罪名又再次降級“對抗共產黨”。

我們家的命運就如同中國的一個一個政治運動,到 1966 年我大學畢業,文化大革命把我們家抄了個底朝天,搗地板、揭瓦、劈開房樑、打爛器物,連續十幾天,父親因“美國間諜嫌疑”,我們全家即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我母親被拷打數小時,昏死過去幾次,之後關起來,當時家里除了一個才 13 歲的弟弟,沒被關,因爲家里還有一個沒滿月的小外甥,是我三姐的兒子,而三姐也被關,13 歲的弟弟負責照看這個剛出生不久的外甥,小孩餓了,弟弟就把他抱到三姐關押的地方喂奶。全家 12 人被關押了 8 人,當時我和二姐在外地工作,一個月內除我父母外,其他兄弟姐妹陸續放回,我母親被關押 3 個月也放回,只剩下我父親還在關押。通常只要有人對我講文革我都會阻止,因爲這是一段苦難的歷史,雖然我那年只有三歲,但父親被帶高牆遊街的情景我也沒法忘懷,但看着計先生我繼續聽着他講的故事:

我父親在關押期間受盡肉體和精神折磨,父親在監獄里得知我們全家均已遭難,讓父親覺得生無可戀,數次自殺未遂,我得此消息,從外地趕回上海,自己找上專案組說:我跟父親最親,我讓父親交代問題,專案組即安排我與父親見面,我用我父親聽得懂的語言,告訴我父親,家中諸人已均安好,即使我出不去,外面還有 9 個兄弟姐妹和母親會爲你申冤,我只想讓我父親堅持活下去。那一天專案組看守把我以“攻守同盟”罪關押,我開始了 21 個月的黑牢生涯。

計先生喝了一口水往下繼續說:在他關了約 3 個月時,一個奇冷的冬天。他被關在四面透風的小屋,一個竹榻擱在兩張長凳上,只一條棉花胎,是沒有被里被面的,怕你把撕成條條用來自殺。白天小屋內水杯都結冰,晚上睡在竹榻上,不脫外面的棉衣,裏着棉花胎都凍的瑟瑟發抖,帶動竹榻震動發出聲音。



計先生繼續說:80 年底他到香港與父母回合,建議父母儘快前往美國,半年後,我父母终于飛到美國,在叔叔安排在加州定居下來。年後我父親見籍,成爲美國人民,開始申請在所有的子女前往美國,幾年後,我的兄弟姐妹陸續全部移民到美國。而我,暫時就留在香港。剛到香港一無所有,第 6 天就開始打工。第一份工,每天的工資是 80 港幣,超過了我在國內任廠長每月的所有工資和獎金。在香港打工的開始階段,每天工作 12 到 14 小時,拼命的干!

今天一晃在外海已經漂了 30 多年,我還記得我離開青島時,山東書法協會兩位書法家,送給我的書法條幅,一幀寫的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另一幀寫的是:“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 試看興風狂嘯者,會眸時窺小芋兔。”我還記得帶着 6 歲的大女兒,前往香港,身上僅有限制兌換的 30 元港幣,到羅湖邊境,延鐵路橋走向香港的時候,回頭望着羅湖關卡上飄動的五星紅旗,心里是五味雜陳,彷彿感覺到像一種背叛! 這時才知道自己有多么地熱愛自己的祖國,我一定會回來的!

90 年代前夕,我已經是一個商人,回到中國上海,找到了救過我命的農民王秀春,那一天我在上海波特曼飯店,約見了 25 年沒有見面的王秀春,我們都有很大的改變,我感激王秀春當年救我命之恩,我建議把她的名字秀改了綵,以表示她的慈悲和善良,她同意了。後來我還做了媒人,把王秀春美麗的女兒與我的朋友的兒子促合結爲夫妻。

這個世界很小,計先生的故事給了我很深的啓發,人對別人好就是對自己好。計先生廣西的醫生是因爲計先生救過醫生的女兒,王秀春救過計先生,計先生幫助了王秀春,世界要美好,只有從自己做起。



一個曾經是童養媳的農民,用她最樸實的話打消了計先生的自殺的念頭。

出獄後,兄弟姐妹都沒有工作,家里沒法開鍋,計先生決心要改變全家人的命運,他只身流浪到青島,想到出生的地方去尋求謀生的出路。他到了青島後,先是在一家校辦工廠打臨時工,他像他的母親,動手能力強,很快在工作中干的出色,他認識了一位在勞動局工作的朋友,他被雇進入自行車公司的零件廠,他從臨時工到轉正,從操作工到管理人員,最後到生產廠長,報上了青島戶口,重新做了出生地的居民,前後計先生活了約 6 年的時間。

那麼你又是如何來美國的? 我急切地問他:“我有一位叔叔是抗戰期間的一批官員留美學生,那批學生中有楊振寧,李政道等優秀人士。當年尼克松訪華後,中美關係緩和,有一個美國華人科學家訪華團來中國,其中就有楊振寧等人,當時我地叔叔是這個代表團的發言人。我這個叔叔 7 歲時,我爺爺去世,我父親就負擔起包括這個叔叔在內的三個年幼弟妹的生活學習,直到他們長大成人。我叔叔利用訪華的機會向外交部的官員提起希望接父母和我們全家去美國定居,以報答養育之恩。那時來一個美國華人,外交部十分重視,通知了我們當地的公安部門,讓我們全家先到香港再轉到美國。”

看來命運要改變我們全家地刻時到了,可是我父親被醫院查是胃癌晚期,檢查出不治之症,那時父親已經中風半身不遂,又加上全身黃疸,並嘔吐大量黃疸,估計只有 3 個月的壽命。由於公安局已批准我父母前往美國,當時鑑於父親的病情,我父親堅持要前往香港去辦赴美簽證。我父親把我從青島召回,宣佈這個決定,在我父親的心中,一定要到美國去,父親的意志非常堅定,絕無商量的餘地,全家只好順從父親的決定。父母到了羅湖,進入了香港的移民局,香港移民局宣佈不準入境,要他們送回中國一邊。我父母堅持不回來,在邊境堅持了兩天兩夜,香港移民局終於被我父母的堅持所感動,放了他們過去。

由於我父親身體不好,一時無法前往美國,就暫時在香港住了下來,奇遇出現了,我廣西有個朋友,是位西醫出生又精通中醫、壯(族)醫、瑤(族)醫的醫生。我把我父親的病情告訴他,他開開中藥治療我父親的病。他開了一些中藥,一大包一大包的寄到香港,給我父親服用。上海醫生說的 3 個月期限過去了,我父親的病情不但沒有惡化,反而漸漸的好起來,並且越來越好,經香港醫院的反復檢查,我父親胃裏的巨大腫瘤,不但沒有再發展,反而萎縮死去,變成一個小小的鈣化硬塊。當我感謝廣西醫生的時候,醫生說:我那有治癌症的藥,只是你告訴我父親的病症,我開了藥方,我父親總是說:這是上帝賜給他的禱告所賜的生命恩惠。

計先生繼續說:80 年底他到香港與父母回合,建議父母儘快前往美國,半年後,我父母终于飛到美國,在叔叔安排在加州定居下來。年後我父親見籍,成爲美國人民,開始申請在所有的子女前往美國,幾年後,我的兄弟姐妹陸續全部移民到美國。而我,暫時就留在香港。剛到香港一無所有,第 6 天就開始打工。第一份工,每天的工資是 80 港幣,超過了我在國內任廠長每月的所有工資和獎金。在香港打工的開始階段,每天工作 12 到 14 小時,拼命的干!

今天一晃在外海已經漂了 30 多年,我還記得我離開青島時,山東書法協會兩位書法家,送給我的書法條幅,一幀寫的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另一幀寫的是:“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 試看興風狂嘯者,會眸時窺小芋兔。”我還記得帶着 6 歲的大女兒,前往香港,身上僅有限制兌換的 30 元港幣,到羅湖邊境,延鐵路橋走向香港的時候,回頭望着羅湖關卡上飄動的五星紅旗,心里是五味雜陳,彷彿感覺到像一種背叛! 這時才知道自己有多么地熱愛自己的祖國,我一定會回來的!

90 年代前夕,我已經是一個商人,回到中國上海,找到了救過我命的農民王秀春,那一天我在上海波特曼飯店,約見了 25 年沒有見面的王秀春,我們都有很大的改變,我感激王秀春當年救我命之恩,我建議把她的名字秀改了綵,以表示她的慈悲和善良,她同意了。後來我還做了媒人,把王秀春美麗的女兒與我的朋友的兒子促合結爲夫妻。

這個世界很小,計先生的故事給了我很深的啓發,人對別人好就是對自己好。計先生廣西的醫生是因爲計先生救過醫生的女兒,王秀春救過計先生,計先生幫助了王秀春,世界要美好,只有從自己做起。